

叢刊 研究 詩歌 古典



明程

第二二輯 第九冊

明代臺閣體及其詩學研究

張日郡 著

花木蘭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二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9 冊

明代臺閣體及其詩學研究

張日郡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代臺閣體及其詩學研究／張日郡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民 106〕

目 2+246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二輯；第 9 冊）

ISBN 978-986-485-120-1（精裝）

1. 明代詩 2. 詩評

820.91

106013429

ISBN-978-986-485-120-1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二輯 第 九 冊

ISBN：978-986-485-120-1

明代臺閣體及其詩學研究

作 者 張日郡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9 月

全書字數 180692 字

定 價 第二二輯共 14 冊（精裝）新台幣 2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明代臺閣體及其詩學研究

張日郡 著

作者簡介

張日郡，雲林人，1985 年生。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文學、古典小說、現代文學等等，著有博士論文《晚清以降《三國志演義》故事新編研究》、碩士論文《明代臺閣體及其詩學研究》，以及多篇論文發表於論文期刊，並參與多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曾任新竹教育大學、真理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教授台灣自然書寫、旅行文學、成長小說等等。

新詩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藝獎、新北市文學獎，逢甲、竹教大、臺大三校文學獎等共近三十座文學獎。曾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已出版詩集《離蝶最近的遠方：旅行、想像與詩的越界》（遠景出版社。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補助、文化部「第 38 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步行之前，停頓之後》（合著）。

提 要

多數學者研究明代詩學時，多關注於明初地域詩學，以及李東陽「茶陵派」、前後七子……等等的詩學發展，但對永樂之後、茶陵派之前的詩學發展，卻經常處於一種「可以被帶過的背景」之狀態，甚至可以被忽略，而其間較為盛行的「臺閣體」往往被過度壓抑，相關之討論幾乎是一面倒的給予負面評價。若我們稍微翻閱今人所撰寫的中國文學史、詩歌史、通史之類的著作，不難發現，其中不是沿襲清代詩論家的主張，成為基本的定見，即是以「忽略」處之，尤其是「臺閣體」的相關詩學論述，幾乎成為一種「真空」的狀態。故本書將焦點放在明代「臺閣體」的形成概況、定義及其詩學理論二大方面，藉此一方面可以銜接明初地域詩學的文學風貌，另一方面也能呈現臺閣體詩家詩論的價值建構，亦能進一步提供明代中期之後復古詩風與詩論的詩學背景。亦透過本專題的撰寫，以期能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補充明代相關的詩學理論研究。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分析方法	13
第三節 論文架構	19
第四節 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20
一、通論文學史及批評史著作	20
二、「臺閣體」及個別詩人之評述	25
三、明代永樂至成化詩文發展評述	28
第二章 臺閣體發展背景析論	33
第一節 內閣制度與政治環境	33
一、內閣制度之形成	33
二、翰林院與庶吉士制度	45
第二節 科舉取士與學術思潮	55
一、科舉取士	55
二、學術思潮	63
第三節 文人治生與經濟狀態	68
一、農業富國與工商業的興起	69
二、消費型態與文士治生之連結	73
第四節 小結	77
第三章 臺閣體定義與範疇	79
第一節 「臺閣」釋名	79
第二節 「臺閣體」釋義	83
一、臺閣之文與山林之文	84
二、「臺閣體」——楊士奇之詩文	88
三、「臺閣體」定義及相關名稱之演變	94
第三節 「臺閣體」作家及其分期觀	106
一、明代詩歌之分期觀	107
二、「臺閣體」作家及其分期觀	112
第四節 小結	122
第四章 詩歌基礎與本源論	127
第一節 「詩三百」本源論	127
一、齊家爲本	128

二、忠君與王道思想·····	133
第二節 「輓詩」本源論·····	139
一、緣情而生·····	139
二、有德者必有言·····	143
第三節 「二位一體」論·····	146
第四節 小結·····	149
第五章 詩歌本質功能論·····	151
第一節 「性情之正」本質論·····	151
一、先秦至唐宋之「性情」淺析·····	152
二、臺閣詩人之「性情之正」論·····	156
第二節 「自然醇正」、「尚趣」本質論·····	163
第三節 藝術「神本論」·····	172
第四節 小結·····	174
第六章 詩歌創作方法論·····	177
第一節 「師古人之心」說·····	177
第二節 「境與心會」、「主靜」說·····	182
第三節 「明體制、審音律」、「氣、學、才、 體」工夫論·····	188
第四節 小結·····	196
第七章 詩歌批評與詩史觀·····	199
第一節 「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論·····	199
第二節 「詩宗盛唐」觀念論·····	209
第三節 「盛世」與盛唐史觀·····	216
第四節 小結·····	225
第八章 結 論·····	227
第一節 本論題之回顧與研究成果·····	228
第二節 本論題之限制與研究展望·····	231
徵引書目·····	235

第一章 緒 論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註1〕這句話對於本書而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思考起點。不論是文學的內涵或形式，往往與時代的轉移有著密切的關係，故藉此去探討文學的「變」與「不變」，以及其所呈現出來的美感特質，為本書所欲突顯出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詩歌發展到了明代，正如胡應麟（1551～1602）所言：「盛唐而後，樂選律絕，種種具備。無復堂奧可開，門戶可立。」〔註2〕基本上，如果再加上宋代的詩歌創作將「尚理」的思想融入其中，中國整個的詩歌體裁上的開發大致已趨於完備。就胡氏之言，所謂的「無復堂奧可開，門戶可立」，確實是明代面臨詩歌創作方面所會遭遇的一大困境，於是好像就只能選擇復古，而無法進一步地創新，我們只要翻閱一些傳統文學史的著作，即可輕易發現此一現象。然而，明代在於整個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貢獻，或許並不在於有無新的開創，而

〔註1〕【南朝·梁】劉勰撰，王久烈等譯註：《語譯詳註文心雕龍》（台北：天龍出版社，1985年3月）第四十五，〈時序〉，頁599。

〔註2〕【明】胡應麟：《詩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續編卷一，〈國朝上〉，頁349。

是詩學理論〔註3〕的建構與進一步的開展，若我們從與詩學理論有著密切關聯的「詩話」來談，並藉此略為觀察明代詩話的編撰情形，或許更能證明其詩學高度發展的情況。

由吳文治先生所主編的《明詩話全編》觀之，全書近八百萬字，除了收錄原本就單獨成書的明代詩話一百二十餘種之外，還輯錄了明代詩家在各種著作中的散見詩論，共編入七百二十二家之多。〔註4〕當然，我們並不能確信這七百二十二家，全部都是對明代詩學極有貢獻者，卻可反應出明代論詩之盛，亦是不爭的事實。另外，蔡鎮楚先生從《中國歷代詩話書目》中考察，明代詩話已知的書目就達一百五十七部之多〔註5〕，從數量上觀之，實不亞於宋代詩話。蔡氏甚至認為明代詩話是「上承宋代詩話，下啓清代詩話，向著文學理論批評的正確方向繼續向前發展，在詩歌體制源流與作家作品研究諸方面，獲得了可喜的成績。」〔註6〕給予明代詩話其承先啓後的關鍵定位，從

〔註3〕何謂「詩學」？吳宏一先生指出：「詩是指詩創作本身而言，詩學則是指對詩的理解與鑑賞，或對詩的原理的看法。」見吳宏一：《清代文學批評論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6月），頁1。

〔註4〕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2刷）第一冊，〈重印說明〉，頁一。

〔註5〕若根據連文萍先生對於明代詩話所進行的詳細考察：「現存者一百四十四種、後人所撰輯者三十七種、已佚或疑佚者一百三十七種，合計三百一十八種。」引自連文萍：《明代詩話考述》（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頁396。

〔註6〕蔡鎮楚：《中國詩話史》（大陸：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刷），頁138。至於連文萍先生則對於明代詩話的價值，有其更加具體的說明：（一）明代詩話在數量上大大超越前代，且開創詩話創作與編刊的新體例。（二）明人在詩話體例的開創上，又有集一人之詩以為詩話。（三）明人對於歷代詩話的整編，也有成績，特別是為數極多的詩法與詩話的彙編。（四）明人標榜辨體的詩話數量亦多。（五）明人不斷利用詩話來回顧、省視前代以及當代的作品的精神，以及不少詩話的嚴謹創作態度，均使得明代詩話更加理論化、系統化，也足以提供今人在從事批評研究上的借鏡作用。（六）詩話是一種社群的產物，特別是明代詩話與詩社的關係極為密切，由明代詩話發展的軌跡，不但可以與清代、民國的詩話互為映證，也能提供現代詩歌研究發展上的思考。引自連文萍：《明代詩話考述》，頁413～414。

此一角度來討論，即可發現明代詩學理論的發展確實值得受到關注。

不過納悶的是，多數學者研究明代詩學時，多關注於明初地域詩學，以及李東陽「茶陵派」、前後七子……等等的詩學發展，但對永樂之後、茶陵派之前的詩學發展，卻經常處於一種「可以被帶過的背景」之狀態，甚至可以被忽略，而其間較為盛行的「臺閣體」往往被過度壓抑，相關之討論幾乎是一面倒的給予負面評價。細究其原因，或許誠如蔡英俊先生所言：「近代以來對於傳統詩論的歷史發展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大體是得自明、清兩代詩論家的詮釋觀點。」

〔註7〕若我們稍微翻閱今人所撰寫的中國文學史、詩歌史、通史之類的著作，不難發現，其中不是沿襲清代詩論家的主張，成為基本的定見，即是以「忽略」處之，尤其是「臺閣體」的相關詩學論述，幾乎成為一種「真空」的狀態。〔註8〕那麼，實際上是否真該如此？如果不應如此，又該以什麼樣的角度重新切入探討呢？

正因為「臺閣體」的詩學較被輕忽，或許我們能從明初洪武、建文時期詩學發展的脈絡先行爬梳，以期對永樂之前的詩學背景，有一個簡明扼要的理解。明初，可謂是「地域詩學」的時代，如胡應麟《詩藪》曾云：

國初吳詩派昉于高季迪，越詩派昉于劉伯溫，閩詩派昉于林子羽，嶺南詩派昉于孫黃，江右詩派昉于劉崧，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註9〕

又，陳田（1849～1921）於《明詩紀事》中亦云：

凡論明詩者，莫不謂盛於弘、正，極於嘉、隆，衰於公安、竟陵。余謂莫盛於明初，若黎眉（劉基）、海叟（袁凱）、

〔註7〕蔡英俊：《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頁154。

〔註8〕詳情請見本章第三節「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註9〕【明】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一，〈國朝上〉，頁342。

子高（劉崧）、翠屏（張以寧）、朝宗（汪廣洋）、一山（李延興）、吳四傑（高啓、楊基、張羽、徐賁）、粵五子（孫黃、王佐、黃哲、趙介、李德）、閩十子（林鴻、王恭、王偁、高棅、鄭定、王褒、唐泰、陳亮、周玄、黃玄）、會稽二肅（唐肅、謝肅）、崇安二藍（藍仁、藍智），以及草閣（李曄）、南村（陶宗儀）、子英（袁華）、子宜（張適）、虛白（胡奎）、子憲（劉紹）之流，以視弘、正、嘉、隆時孰多孰少也。〔註10〕

胡應麟認為明初詩派有五，尤其是以地域的觀點來分別，共分為吳派、越派、閩派、嶺南派，江右派，這些詩派全部集中於東南地區。而陳田除了標舉出一些明初的重要詩家之外，甚至他還認為明詩「莫盛於明初」。同樣，我們可以看到陳田亦以地域的觀點來區分，如吳四傑、粵五子、閩十子、會稽二肅、崇安二藍等等。由此可知，明初洪武、建文時期的詩壇，所呈現出來的應是一種地域詩學的概念，這在整個明代是相當特殊的現象。〔註11〕然而這時期的詩壇現象，其實肇始於元末明初的政治文化環境，誠如大陸學者辛一江先生〈論元末明初越派與吳派的文學思想〉裡提及：

元末明初的文學思想是相當活躍的，尤以東南為著。東南地區從南宋開始就已成爲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元末戰亂，東南相對穩定，成爲文人的避亂之地，加上割據東南的張士誠輩附庸風雅，各種文學社團也應運而生。……。同社社友切磋砥礪，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詩文流派。明代作家常談的明代詩文流派中，大都肇始元末。在元末明初眾多

〔註10〕【清】陳田：《明詩紀事》（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學林類10》，台北：明文書局），〈序〉，頁012～403。

〔註11〕根據丁威仁針對《明詩紀事》中收錄洪武、建文二朝的詩人所做的考察與統計：浙東（越）八十餘人、蘇州（吳）一百三十餘人、江西（江右）五十五人、閩中（閩）四十人。這四個流派人數總共約佔明洪武、建文詩人的百分之七十五，可為明初地域詩學的佐證。引自丁威仁：《明洪武、建文地域詩學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初版），頁4～5。

詩文流派中，最值得重視的有兩派，即越派和吳派。〔註12〕

此段引文可謂解釋了元末明初詩派眾多的原因，而所謂的越派即是浙東派。朱元璋（1328～1398）於洪武元年（1368）推翻元王朝，在南京建立明王朝之後，首先恢復了中華禮樂衣冠〔註13〕，並且爲了鞏固明初的政權，在社會文化的掌控層面，導入儒家思想作爲主軸，特別是以程朱理學爲主。由此可知，儒家思想於明初專爲政治服務的傾向。而建國後一系列制度的設定，不管是政權的建立與穩固，還是明初文化思想的發展，浙東爲主的文人群可謂佔有相當關鍵的地位，據廖可斌先生之研究曾指出：「明王朝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淮西武力集團與浙東文人集團相結合的產物。」〔註14〕這樣的觀察可謂確論。

除了浙東文士之外，這當中還有其他地域的文士，亦擔任過明初政府裡的重要幕僚，但經過朱元璋開國之後，所採取的高壓統治政策，不斷地濫殺開國功臣與知識份子，這一系列對文人的迫害，使得明初

〔註12〕 辛一江：〈論元末明初越派與吳派的文學思想〉，《昆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1卷第3期，1999年9月，頁22。

〔註13〕 此點可從陳昌明先生所言得知其內涵，其云：「中國每以衣冠文物連言，在儒家看來，衣著代表著人文極重要的一項。《論語·堯曰》篇第二章中孔子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誠如錢穆先生所云：『瞻視屬於身，衣冠乃身外之物，但不能衣冠不正而專求尊瞻視，正衣冠正是尊瞻視一項必然連帶的條件。瞻視屬於自然，但必要尊瞻視，便是把人文來加在自然上。』重視衣冠活動正是儒家建立人文秩序的重要一環，所以孔子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基本上即把衣服視爲文化的象徵。因爲對於形體容止的重視，就是禮的基礎，而衣冠正是由此延伸出來的：『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色令。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衣冠不止是身體的外在之物，而且是形體外顯的表現。所以《左傳》記載子路在衛遇難，在兵戈交加中身殉，死前猶曰：『君子死，冠不免』（哀公十五年）故正纓結冠而死，似乎衣冠猶勝過生命，此處衣冠不但不是身外之物，而且是一種生命的莊嚴表現。」見陳昌明：《從形體觀論六朝美學》（台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1992年），頁23～24。

〔註14〕 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2月初版），頁51。

文壇精英幾乎斬芟殆盡。^{〔註15〕}再來，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1360～1424）「靖難之變」奪位稱帝，浙東派最後一個代表人物方孝孺（1357～1402）因不肯為朱棣起草登基詔書，而遭連株十族——宗親九族加上門人一族全部被株——導致明初以來最重要的浙東文人群一蹶不振，其實正象徵著浙東派主宰文壇的時代已經結束。同時，是否也透露出明初以來的地域詩學跟著瓦解呢？這個問題，對於隨後永樂時期逐漸盛行起來的「臺閣體」，有著政治與文化層面轉折的關鍵性。

由於朱棣奪位稱帝之後，對於洪武、建文時期的舊臣依舊懷有戒心，尤其是淮西勳貴以及浙東文人群，這樣的結果造成永樂帝當時所重用的文士中，江西人佔了多數。例如《明史》卷一百四十七〈列傳〉第三十五「解縉」一條所言：「成祖入京師，擢侍讀，命與黃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胡儼並直入文淵閣，預機務。」^{〔註16〕}此內閣的七人名單之中，江西人就佔了五位。再者，方孝儒被殺之後，江西吉水人解縉（1369～1415）於永樂稱帝之初，擔任《太祖實錄》與《永樂大典》的總裁，儼然成為一代文宗。不過，這時間卻相當短暫，解縉於永樂五年（1407）遭黜、永樂八年（1410）入獄、永樂十三年（1415）紀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而死。隨後同樣是江西人的楊士奇（1365～1444）繼之，成為新的文壇盟主，如李東陽（1447～1516）於〈呆齋劉先生集序〉中曾言：「永樂後至於正統，楊文貞公實主文柄。」^{〔註17〕}如此說來，江西人多在政治或文壇上位居首要，可謂自永樂朝開始建立。

〔註15〕 以下略舉幾例：（1）浙東派「宋濂」因長孫宋慎與胡惟庸一案有牽連，舉家流放茂洲，行至夔州病死，次子宋璉與宋慎皆被處死。（2）吳四傑中的「高啓」，因為魏觀作《上梁文》而被腰斬；「徐賁」遭訴地方官犒勞不時，下獄死。（3）粵五子中三人「孫蕡」坐藍玉黨死；「黃哲」坐法死；「趙介」逮赴京途中卒。詳可參見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上）》，頁73、105～107。

〔註16〕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4月第1版第1刷）第14冊，卷一百四十七，〈列傳〉，頁4120。

〔註17〕 【明】李東陽著、周寶賓典校：《李東陽集》（湖南：岳麓書社，1984年1月第1版第1刷）第二卷，卷之五，〈呆齋劉先生集序〉，頁74。

至於江西人得以崛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得力於明代的科舉制度，我們可藉由一些歷史文獻來進一步佐證。例如歷事永樂至正統四朝的內閣大臣楊士奇在〈送徐僉憲致仕序〉云：「四方出仕之眾，莫盛江西，江西爲縣六十有九，莫盛吉水。」〔註18〕而嘉靖時期羅洪先（1504～1564）在《吉安進士錄序》亦云：「我朝開科一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舉進士者七百有九十人，可謂盛矣。」〔註19〕同樣在《列朝詩集小傳》中所載：「國初館閣，莫盛於江西，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語。」〔註20〕由此可知，至少在明代嘉靖以前，江西人透過科舉進入翰林，就佔了大半。暫且以明代永樂至正統這段時期作爲初步觀察之指標，並以表格 1.1 進一步呈現〔註21〕，藉此突顯江西人長於科舉的現象：

表 1.1

姓名	籍貫	取得功名時間	官職
胡儼	南昌	洪武末進士乙科	永樂初直內閣，升國子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
梁潛	泰和	洪武二十九年舉人	永樂初官翰林修撰，兼左春坊右贊善。
金幼孜	新淦	建文元年進士乙科	永樂初直內閣，升文淵閣大學士，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胡廣	廬陵	建文二年狀元	永樂初直內閣，歷侍講、侍讀、翰林學士，進文淵閣大學士。
鄒緝	吉水	建文二年進士	永樂初授翰林檢討，官至左春坊左庶子。
吳溥	崇仁	建文二年會試第一	永樂初官翰林修撰，遷至國子司業。

〔註18〕【清】黃宗義編：《明文海》（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2月第1版第1刷）卷二八七，頁2981。

〔註19〕【清】黃宗義編：《明文海》卷三〇一，頁3113。

〔註20〕【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第1刷），〈周講學敘〉，頁172。

〔註21〕此表製作根據廖可斌初步的整理，見氏著：《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上）》，頁93～95。

姓名	籍貫	取得功名時間	官職
曾棨	永豐	永樂二年狀元	歷侍講、侍讀、右春坊大學士。
王英	金溪	永樂二年進士	選庶吉士。侍講學士累遷至南京禮部尚書。
王直	泰和	永樂二年進士	選庶吉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周忱	廬陵	永樂二年進士	選庶吉士。工部尚書。
李時勉	安福	永樂二年進士	選庶吉士。國子祭酒
周述	吉水	永樂二年榜眼	翰林編修，官至左春坊左庶子。
周孟簡	吉水	永樂二年探花	授編修。
余學夔	泰和	永樂二年進士	選庶吉士。官至侍講學士。
李昌祺	廬陵	永樂二年進士	選庶吉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
張徹	新淦	永樂二年進士	官至吏部郎中。
羅汝敬	吉水	永樂二年進士	選庶吉士。翰林修撰，官至工部侍郎。
錢習禮	廬陵	永樂九年進士	選庶吉士。官至禮部右侍郎。
熊概	吉水	永樂九年進士	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陳循	泰和	永樂十三年狀元	翰林修撰，官至少保、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曾鶴齡	泰和	永樂十九年狀元	翰林修撰，官至侍講。
劉球	安福	永樂十九年進士	翰林侍講。
周敘	吉水	永樂十六年進士	翰林侍講學士。
蕭鎡	泰和	宣德二年進士	景泰中，以祭酒、學士入直內閣，加太子少師戶部尚書。
吳節	安福	宣德四年會試第一，明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撰，成化中，官至太常卿兼侍讀學士。
李紹	安福	宣德八年進士	選庶吉士。授檢討。天順中，官至侍講學士禮部侍郎。
劉定之	永新	正統元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三	授編修，成化中，以太常少卿、侍讀學士直內閣，進侍郎。
劉儼	吉水	正統七年狀元	選庶吉士。授修撰，景泰中，官至太常卿兼侍讀學士。
彭時	安福	正統十三年狀元	授修撰，正統末，官至少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我們經過上述表格的整理，首先可以發現籍貫為江西吉水者七人最多，第二為泰和六人，第三為安福五人。再從「取得功名的時間」——從建文開始至正統年間——江西人科舉多中甲科。一甲即授以翰林修撰、編修等職；二、三甲進士的部分則選為庶吉士。〔註22〕這表示著江西人能在翰林院、六部、內閣裡維持著一定的人數，至於庶吉士的選拔，約略說明一下：

庶吉士之選，自洪武乙丑，擇進士為之，不專屬於翰林也。永樂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榮、周述、周孟簡等官，復命於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專屬翰林矣。復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榮，編修述、孟簡，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自陳少年願學。帝喜而俞之，增忱為二十九人。……。是年所選王英、王直、段民、周忱、陳敬宗、李時勉等，名傳後世者，不下十餘人。〔註23〕

從上述表格及引文，我們再進行綜合歸納可以發現幾點：

（一）洪武十八年，「使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成敕監等衙門者，曰庶吉士。進士之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註24〕可見當時庶吉士已經可以進入翰林院了，只是並不專屬於翰林院。

（二）永樂二年，庶吉士已專屬翰林。第一次的選拔條件以「文學優等」與「善書者」為優先，人數六十人，再命解縉再從中選其「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人數二十五人，精選一半之多。

（三）此二十九人中（包含周忱）〔註25〕，江西人就佔了二十

〔註22〕詳情請見「第二章臺閣體發展背景析論，第一節之二『翰林院與庶吉士制度』」。

〔註23〕【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6冊，卷七十，〈選舉二〉，頁1700。

〔註24〕【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6冊，卷七十，〈選舉二〉，頁1696。

〔註25〕具體名單據《翰林記》所載如下：「先是太宗命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新進士中選，材質美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

人之多，卒業後官翰林者七人。「宣德甲寅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選之，亦如甲申之數，出江西者七人，留翰林者四人。」〔註26〕宣德同樣有此狀況，只是人數較少。

（四）已然隱約透露出，由翰林官員至內閣大臣這一條政治升遷之路徑，「庶吉士始進之時，以羣目爲儲相。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註27〕同時，這也形成了一個「文學」上的梯隊。

於是，我們發現明初浙東派文人所掌握的文化重心，可謂自永樂始開始轉移到江西派手中，其時間橫跨了好幾個帝王朝代，且至少延續到「正統」末年爲止。如果，再進一步連結一般認知中的「臺閣體」興盛時間，以及「臺閣體」的作家名單，將會發現兩者重疊的部份相當的多，而這之間密切的關係，絕非偶然之現象。如果說「臺閣體」真正興盛的時間，是從永樂初至正統末四十幾年〔註28〕，那麼最主要變化的時間點，應當是正統十四年（1449）發生的「土木堡之變」，也就是說，構成「臺閣體」盛世基礎的客觀條件，在這個時間點之後已然失去。接下來的景泰至成化年間，文壇其實出現了許多不同於臺閣體的聲音（但還是以所謂的「臺閣體」爲主，只是批評聲浪漸起），例如景泰十子（劉溥、湯胤勳、蘇平、蘇正、沈愚、王淮、晏鐸、鄒亮、蔣主忠、王貞慶）、理學五賢（吳與弼、薛瑄、陳獻章、羅倫、莊昶），以及蘇州文學的逐漸復興。此後，弘治時期李東陽（1447～

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啓、袁添祥、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引自【明】黃佐撰：《翰林記》，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6年初版）卷四，〈文淵閣進學〉，頁37～38。

〔註26〕【明】黃佐撰：《翰林記》卷十九，〈文運〉，頁342。

〔註27〕【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6冊，卷七十，〈選舉二〉，頁1701～1702。

〔註28〕廖可斌先生持此一論點。引自氏著：《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上）》，頁117。